

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
二月刊

文系研究室編文系修習用
苏联专家著述真迹獨特
中文亦翻译登



文系教材 請提意見
本刊發行 仅供參考

北京師大文系俄文系
1956—1957學年度第二學期

俄罗斯文学史

小说“怎么办”是俄罗斯文学中的第一部社会政治的和革命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是在短时期内（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开始，一八六三年四月四日完成）在彼得堡罗蒙内写成的，它是伟大的作家——战士对革命青年所写的政治教训。长篇小说“怎么办”光辉地体现了这位伟大的俄罗斯革命家和思想家的政治、哲学和美学的观点。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回答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所关心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也就是说回答了要从独裁的农奴专制制度中解放祖国就该“怎么办”的问题，以及那些要想成为自己祖国、自己人民的有用的人们该怎样生活的问题。

虽然检查机关的禁令很严厉，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小说中仍然提出了下列的当时中最迫切的问题：列举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妇女的解放；新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合理的利己主义”要求为基础的新道德，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自由劳动，社会的改造和革命斗争的必要性。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依靠了他的先辈，即俄罗斯文学的古典作家们：如普希金、莱蒙托夫，特别是果戈里和赫尔岑等而创造出的庞大传统。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俄罗斯文学的前一个时期称为“果戈里时期或是批判主义时期”，但是仅仅对与他同时代的生活的批判已经是不能满足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了。他要求俄罗斯文学这样反映生活，就是那种反映能帮助读者了解现实是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对未来应期待什么并且为这种未来的来到做些什么。因此，他在写作自己一些短篇小说的时候就没有局限于仅之描与旧俄国，没有局限于描绘并评价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维护这种制度的反动力量和

自由主义分子。作家给自己的长篇小说所拟定的名称「关于新人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长篇小说的主要内容是描写「新人」的生活，即是说描写能够成为别人效法的模范的那些人们的生活，如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

长篇小说中的「新人」们遭遇到的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旧派人物，是旧观念和旧习惯。这也就构成了描绘六十年代俄罗斯生活图景的现实主义的背景。

旧世界的代表人物按其自己的社会地位来说是很不一致的。因此就可以把他们分成四类：(1)「上流社会」，(2)「官方与文明」安息的辩护人——「敏感的读者」(3)小市民和(4)社会的牺牲者和渣滓。

属于第一类的有史托莱希尼科夫家的母亲和儿子；谢尔日·索洛夫佐夫和「极具可贵的青年」的其他代表人物。

把史托莱希尼科大家中的母亲和儿子描写得特别突出，因为他们在小说的情节当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在上层贵族社会里，人类的一切高尚感情都是被歪曲和被压制着的。在史托莱希尼科大家中，母亲对儿子和儿子对母亲的热爱和眷恋以及他们之间的互相尊敬是不存在的，围绕着财产权的争吵和渺小的虚荣心的斗争——这便是儿子和母亲联系的基础。

作者从阶级本源描写了这位愚笨、好口角和傲慢的贵族夫人安娜·彼列罗夫娜·史托莱希尼科娃。由于她是富有的和有教养阶级当中的女，这样便使她不必从事于劳动了。她从幼年时候便养成了典型的「优越」感和对下层的蔑视态度。这在她对儿子解释他结婚的事情的情景中表现得极为清楚，在这里她把薇拉·巴夫洛夫娜称做是「一个出身微贱、微末浅薄、品行下流的人，甚而是一个卑鄙的人。……」。

她那种贵族老套式的宫廷态度当中的拘谨和伪装她的虚假

的慷慨和大方，在她和彼得罗奇卡的父亲巴维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谈话的情节中表现得很清楚：

「——唔，我很高兴；我仍旧可以同你做朋友。我要报答你。我马上就要报答你。二楼靠前门的那套房间，原先是被锁住的，不是空出来了么？」

「再过三天就空出来了，太太？」

「您把它留给自己用吧。您可以花这么一百卢布装饰一下。我每年还要给您加两百四十卢布薪水！」

「请让我吻太太的手吧！」

「好的，好的。姐姐雅娜！」大丁头进来了。（把我那天蓝鹅绒大衣找出来，这件大衣我送给您的太太，值一百五十卢布（其实是一百二十五卢布）呢，我只穿过两次（其实远在二十次以上）。」这个，——安娜·彼得罗芙娜给管理人一只很小的女式锁，——「我送给您的女儿，我花了三百卢布（其实是一百二十卢布）买来的。我懂得怎样报答您，而且您也不会忘记您，我对于青年人的胡闹一向是不介意的」。（译文见蒋路译：「怎么办？」，第90页）。

为了达到更大的表现力，车尔尼雪夫斯基通常就不大注意去描写细节，而利用精确诗述的方法。

在自己「对青年人的胡闹一向是不介意的」态度当中，安娜·彼得罗芙娜无疑地是造成了一种令人讨厌的印象：「我早知道米雪尔在追您的女儿了。我没有干涉，因为青年人你不让他乐一乐他是活不下去的，我对于青年人的胡闹向来不介意，但是如果沾辱我的门第，我可受不了。您的女儿怎么跟有这种思想？」（同上书第89页）。

安娜·彼得罗芙娜是按照一个人的财富和地位，而不是按他的个人品质来评论这个人。她的庸俗道德是在一族的压迫

和杜会基础上产生的。

史托莱希尼科夫是「许多人当中的一个」，他也是非常富于典型性的。他是一个尊鄙贵族青年的鲜明的典型，是一个圆滑、腐化、虚荣、无知和无耻的动人。米雷尔·史托莱希尼科夫和他的朋友们的兴趣是低级的，他们的发展水平是很低的。观察能是庸俗的，对妇女的态度是野蛮和粗暴的。史托莱希尼科夫这一辈人的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在「漂亮」的饭馆里的狂欢和燕乐以及和「整个贵族青年都知道」的法国女人往来为荣誉、感觉的迟钝，智慧的枯萎和懒惰以及寄生的生活方式等：这便是这些剥削阶级代表们的特典。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揭示史托莱希尼科夫的精神世界的真实和智力的畸形时，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礼服外表的燥热和他的威严的雍容。

统治阶级的代表者们从童年起就不需要去操作和劳动。寄生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腐化了，使他们不能从事于有益的社会活动。

史托莱希尼科夫对社会生活与职责都不感兴趣，他的闲暇时间都消磨在和女人鬼混与放荡的行为中。史托莱希尼科夫听说他那圈子里的人都应该有一个情妇，于是他决定去勾引薇罗奇卡，「他开始向罗查利斯基一家人献殷勤，而且总是向女儿谈得多，向管家夫妇谈得少」。薇罗奇卡长得很漂亮，比他别的一些情妇以及他一些朋友的情妇都好得多。为了要得到朋友的尊敬和赞赏，他力求使他们调和他和薇罗奇卡之间的恋爱关系。米哈依尔·胡凡诺维奇在知道不能把薇罗奇卡变成他的情妇的企图失败以后，他只得决定和管家的女人结婚。这一次走狗的主要动机乃是神经过敏的感觉和虚荣心、愤怒、自尊心和情感；不祥预兆着「他对于自己所喜欢的东西的感到，以及不顾

放弃自己的懒惰和嗜好的习惯。

米哈依尔·伊凡诺维奇的愚蠢在向薇罗奇卡进行表白的一场中明显地暴露出来了，甚至玛莉亚·阿列克塞耶夫娜也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这位未来的女婿，她说：“傻瓜，有这样的傻瓜他只会翻白眼”。

在说明史托采希尼科夫和朋友们，和罗查利斯基一家人以及加她的母亲的相互关系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他的主人公放在一个不利的滑稽可笑的地位上，并且用了快活而滑稽的笔调彻底地暴露了他。

然而在小说里还否定了不同职业的和拥有不同财产的人羣中的贵族青年的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化的貴族代表人物。本书中的情节结构里提示了一些插曲式的，但是个别化的并容易被人记住的人物。这就是並不愚笨的，恬不知耻、食得无厌，游手好閒、卑鄙龌龊和庸俗不堪的展恩。索洛夫佐夫也是和史托采希尼科夫打赌的发起人。他有两个情妇，月尔姐和小奥特等。但是他还要从史托采希尼科夫手里抢走美丽的薇罗奇卡。车尔尼雪夫斯基写出了索洛夫佐夫评论薇罗奇卡的外貌的卑鄙言论他说：“你对于你過着想象描绘出来的东西不要失望，将来你所发现的甚至比你此刻所想的还要好呢。我观察过了：你会满意的。”（同上书第51頁）。在小说结尾处他又以小说中女主人公波洛卓娃的未婚夫的角色出现。为达到他的目的，森恩·索洛夫佐夫是不惜採用任何手段的。他为了要得到有钱的新娘，特别会裝出熟悉的样子来。索洛夫佐夫是“纨绔子弟”的典型代表，是一个道德沦丧的野心家，对于他来说，感情变成了进行买卖的商品。

在上流社会的青年里，道德品质最好的是谢尔日，他雖然有教养，溫柔和高尚，但是完全不善于斗争，不善于行动起来。他无法克服他的冷感和冷漠的心情。他是一个无益于社会的人。

而且他自己也坦白地承认，他只「适合陪伴柔丽到她带我去的任何地方，我的用处是让柔丽能够寻找次作乐」。在谢尔日的形象中，综合了杜勃洛留波夫在他有关「大雷雨」的主人公鲍利斯的评论而清楚地确定了的那种典型人物的特征，他说：「教育使他失去了做坏事的力量，但是她并没有给他以反对别人所做坏事的力量。」

谢尔日性格上的主要特征是意志薄弱。虽然他在周围人身上看到了精神上的腐臭，道德上的腐败，以及所有压倒一切的罪恶，甚至他模糊地意识到起来反对这种现象的必要性，但是他宁可做一个中立的，漠不关心的旁观者。而且他还企图借口于客观环境来辩护他对生活的无能作为而消极态度。他的薄弱的意志，他引用着俄罗期的明智的谚语说「墙头推不破墙壁」。谁诱惑了姑娘，不都是一样，不管是史托莱希尼科夫或者是一个男人，既然母亲存心出卖女儿。「你们全都是些卑鄙的傢伙！讨厌的傢伙！我在巴黎当过两年妓女，还在一个贼窟里待了半年，可就在那儿我也从没碰见过这么三个下流东西凑在一起！我的上帝，我在社会上接触到的都是些什么人啊！」……谢尔日，你也是这样的人吗？」——她的柔丽向他——「不，你比他们好！〔比他们好，〕算官冷漠地说〕难道这不是卑鄙吗？」「是卑鄙呀，柔丽。」「那求你默认吗？密许吗？同意吗？参加吗？」

(同上书第52页)

但是谢尔日没有能力对周围的卑鄙行为进行斗争，他的唯一的抗议方式就是拒绝和史托莱希尼科夫一同进晚餐：他不能为改造社会而进行积极的斗争。谢尔日是六十年代「多余的人」的一种形象。

这样，卓尔尼雪夫斯基以活生生的、突出的艺术形象来显示「上流社会」的人物，便读者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就是寄生虫吸食着整个社会，他们是「多余人」的典型代表。

生的生活方式腐蚀了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使他们不敢有有益的社会生活。他们的兴趣不能超出由于厌倦生活而产生的个人欲望的范围之外。他们的性格的基本特征是寄生行为和享乐主义。无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他们已经是不能改变的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了剥削社会代表人物所以道德沦丧的原因，他说：“有懒惰的地方就有丑恶，有奢侈的地方就有丑恶。”（全上书第77页）。

在思想和精神面貌上把自己作为正式意愿的化身的“敏感读者”是接近于上流社会的代表人物的。在“敏感的读者”的形象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描写了阶级的对抗者，不可调和的敌人，满足于现有制度，不願听从劝告而保守阵营里的代表人物，他们是政治的善良意图的捍卫者，有命是道德的守护者，永远乐于揭发别人和出卖别人，是妇女解放的敌人，也是一切新事物的敌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谓“敏感的读者”这个一般的名称，不仅是精于学识的，是蠢的，有满有足的和固执守旧的那些庸俗之士，而且也是精贵族阶级阵营中的有局限性的，卑贱的作家和自由主义的批评家们来说的。这些入装作有教养的样子，大谈其艺术性的向题，但是他们对于真正的艺术是毫无所知。

车尔尼雪夫斯基嘲笑了自己的敌人，自由主义阵营和保守主义阵营中的文学家和群雄家：“男读者当中也有不少并不愚蠢的人，我也不拘这些男读者怎样；但大多数男读者（几乎所有的文学家和群雄家金色插在内）都是敏感的人，我永远高兴同他们谈天……啊！你多伶俐，敏感的男读者：只要你对我一说起什么，你马上会破口道：‘我知道这个啦，’并且因为自己的敏感而得意扬扬了。我敬佩你，敏感的男读者。”（全上书第348页）

「敏感的读者」——就是那种对于文学和科学的问题很自负地夸夸其谈的人，其实他们对于这些问题是一竅不通的，而其所以要强作解释，并不是这些问题真正使他们感到兴趣，而只是为了要炫耀自己的聪明（这种聪明不是他生来就具有的），炫耀自己的崇高的期望，这种期望在他身上并不比在他所坐的那张椅子上高尚多少）和炫耀自己的学识（他的学识如同蹒跚的学识一样多）。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同敏感的读者的对话中，以诙谐的方式重提了「现代人」中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同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阵营中的自己 的敌对者的论战。并且，车尔尼雪夫斯基知道，在自由主义分子和民主主义者之间的相互了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也不打算说服「敏感的读者」来相信自己的观点，而他是有另外一个目的的，这就是要表明自己的思想敌人的愚蠢和矛盾，使他们的观点和意见在广大的社会人士的心目中，在善良的，但是无「判断力的」和「脑筋迟钝的」公众的思想中遭到反对，全部的小说都是特别注意到这种公众的；要使广大的公众看到未来的远景，并按其品格来评价那些为未来而斗争的人们，他要求以关切的态度来对待关于「新人」的故事。（我之所以要如此详尽地描摹这一个罕见的典型，并不是想教你，敏感的男读者，怎样用你所不知道的合礼的态度去对待这种人，因为这样的人你连一个也没有发现过；你的眼睛是看不出这类人物的，敏感的男读者；对于你，他们是不可见的；惟有那正直而勇敢的眼睛才看得到他们；我描摹这人的目的是让你知道（纵然是得之传闻）世界上有了怎样一批人。至于这段描摹对女读者和普通男读者的用处，他们自己会明白的（全书第 507 页））

「敏感的读者」的综合形象在小说的篇幅上第一次在第三章

中出现了，在这一章中平行地描写了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诺夫的性格。而在描写拉撒美托夫的性格和评价她的活动时，又出现了这种形象，并且整章都得到了相应的名称：〔和敏感的读者谈话，他的被逐〕。车尔尼雪夫斯基同他作了个公开的斗争，称他是〔丑恶的面孔〕和〔装扮的姿态〕，他从小说的篇幅上把他赶出来，并迫使他沉默起来，用餐巾封住了他的口。但是在驱逐之后，作者在书来说明小说中正面人物的世界观和行为的时候，又屡次地描写了这个讽刺的形象；当捕与罗普霍夫，薇拉·巴夫洛夫娜和吉尔沙诺夫的关系的结局时，和在叙述他们对爱情和婚姻的观念时，以及后来在提到薇拉·巴夫洛夫娜进入医学院当学生时，这时又有不大的单独的一章，标名为〔关于蓝珠子的谈话〕来特意描写了〔敏感的读者〕。

把“敏感的读者”的形象引进长篇小说里说明了必须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作者在检查条件下不能公开说出的东西上。

至少小市民是阻止新生活成长，阻碍运动前进的可怕力量。罗查利斯基一家是以革命前的俄罗斯的这一阶层的典型代表者描绘出来的。这个家庭的特典是狭窄的思想和社会眼界，局限于个人的利益。

薇拉·巴夫洛夫娜的父亲是六十年代的典型的彼得堡的官吏，他的眼光狭小并喜欢打小算盘，他是胆小的，懦弱无能的人，逢迎上层及有势力的人，但是，他有随机应变的处世才能这一特点使他在事业上获得成就并得到提升。

虽然瓦西尔·康士坦丁诺维奇遵循生活中的原则——“应该凭良心”，然而，他拼命地累积了主人的三千块钱，其余的则放款生利，而未受到良心的苛责。

车尔尼雪夫斯基通过人物的语言的个性化达到形象的特殊表现。长年实践的实践形成了一定的词藻。例如，在同《罪与

的夫人说话时说：「我虔诚地向你讲，」，他常常用这样的一些动词，如：「我不勇敢」，「畏缩」，「实在不敢」，「永远不敢」，当人性很大的夫人在场时，他从来也不敢高谈阔论，而是恭恭敬敬再思再想地讲：「上帝会使年轻人聪明起来的。」

巴威尔·康士坦丁罗维奇的家庭中没有独立性，他完全服从自己的妻子，她是一个刚毅的，有势力的，相当聪明并非常自私的女人。

作者用极大的心理上的说服力把玛丽亚·阿列克谢也夫娜的形象表现出来了。这个女人的一切行为都仅仅被一个目的支配着，这个目的便是：个人的利益；社会利益对他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她的一切思想和希望都局限于家庭生活的小天地中。

玛丽亚·阿列克谢也夫娜是一个极其机警的，善于攫取个人利益的人，和她丈夫一样，她是用放利（要抵押品）的办法来赚钱的，同时玛丽亚·阿列克谢也夫娜比她丈夫做得更冒险些，因此（她所获得的利润也就更快一些）。她的生活理想是发财。

她的发财的办法是贪婪，这样，攫取财富便是玛丽亚·阿列克谢也夫娜的生活的意义和内容了。她准备用一切办法去获得财富，在每一个行动里她都受物质利益的支配，她的丈夫在职位上的飞黄腾达是用他（作为妻子）的名誉的代价来取得的，为了要使她的丈夫取得某一个位置，她便不惜去做有势力的人的情妇，甚至于对她亲生女儿的婚事，她也是从纯粹商人的角度来看待的。玛丽亚·阿列克谢也夫娜也准备出卖薇拉·巴夫诺夫娜，如果这个买卖是只要用合法的婚姻手续来办理的话（这里「为了她本身；即薇拉·巴夫诺夫娜的利益。」）。

如果对自己没有好处她是不会和人们接近的。

当她在使自己的女儿和儿子受「教育」的时候，她也是从

将求可能得到的利益的原则出发的。

甚至于在生命中最悲剧性的时刻里，害怕遭受物质损失的心理也不能离开她。当女儿从家中逃跑的时候，在她的意识中便首先浮现了这样 的思想：“她偷走什么东西了？”，而在回到家里的时候，她便急忙地开始检查她逃走的女儿的财物。玛丽亚·阿列克谢也芙娜是一个粗暴和庸俗的人。当她对女厨师说话的时候便挥动拳头，在“教育”女儿的时候便殴打她的肩膀，为了每一个鸡毛蒜皮的事都要责备她并侮辱她的人格。她的贪婪程度是令人难以忍耐的：她在橱柜里锁着糖罐，“喝淡了”的茶，茶里还堵着一个臭不可闻的糖块，还有用昨天的汤里的牛肉做馅子而制成的馅饼等。

通过语言的描绘，玛丽亚·阿列克谢也芙娜的性格特别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她的语言也就和她自己一样是粗暴而幼稚的：“我要把他藏在袋子里带到教堂去，抓住他太阳穴旁边那缕头发，叫他沿着祭坛台圈之转”，“臭肚里的粪，不搅不臭！她的骂人的词句也是非常之多的：傻瓜，坏蛋，蠢驴，流氓，猪猡丑陋的傢伙，无耻的女人，混蛋，强盗，不中用的女人，下流的女人，大傻瓜。”

诚然，玛丽亚·阿列克谢也芙娜有时也遭受良心上的苛责，但是第一，这种情形是很少有的，第二，她不能改变自己的行为，第三，她在“哲学上”能为自己的行为作辩护（她很公开地向她的女儿说出了自己的人生哲学：诚实的女人便会生活得很坏。（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不诚实和恶毒的人才能过好日子）

（同上书第43页）。她是按照阶级社会中的旧的、弱肉强食的法则来生活的：“旧制度是怎么样的？你们书上写得有：旧制度就是掠夺和欺骗。这倒是真理，诚罗奇卡。所以，既然没有新制度；那就得照旧制度过生活：掠夺和欺骗”（同上书、

第44页)。从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的口里说出了资产阶级和小市民社会的虚伪的利己主义。这种道德奴役着和摧残着人的弱个性，消灭它优秀的憧憬和盼望，并使人类个性变成遭受卑鄙的阴谋诡计的毒害的对象。

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的形象也是很可怕的。因为她相信自己生活经验的优越性，相信自己对生活、对人间幸福和安宁的观点是正确的。她认为人间的一切美德只是建筑在谋私利害，欺骗和撒谎之上的，只有用这些手段才能达到所希求的目的——发财致富和物质上的满足，所以她在一切方便之时就尽力来积聚金钱和欺骗别人。

一些没有失去感觉和思维能力的人们，是不能忍受这种两人的小市民的环境的，所以他们竭力想摆脱这种环境，想离开它，(我怎样还能有力量来生活在这样的污浊的环境中呢？我怎样还能在这种地下室中呼吸呢？这是太奇怪了，太不可理解了：我怎么能够在那里怀着对于善良的热爱来成长呢？)

虽然如此，还必须指出，尽管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是令人讨厌的和可怕的，但是她并不像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卡尼哈那样的危险。车尔尼雪夫斯基描写了一种新的情势，即是说新的东西正与鄙地开始战胜旧的东西。因此，要是悲剧式地结束是很危险的。所以就喜剧式地结束了。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在自己的愤怒中和在自己的言语中所以是滑稽可笑的，就是因为她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她是失败者。对这形象作最后的评论(《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颂》)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正是从正在产生的新事物的角度来评论玛丽亚以及与之相类似的一些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描绘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的这些丑恶特点时，同时也指出，问题并不在于这个女人的本身上，而

是在于形成她的生活观美的环境和社会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与唯心主义派的作家——道德家们不同，他是尽力来强调：问题不在于他所描写的“旧俄国”代表人物的不良的个人品质，而是在于也决定着托尔斯泰和罗查里斯基这类人们的生活美的那些条件和制度的本身。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随着旧制度的崩毁，上层剥削者的道德腐化和堕落，乃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他还认为，对小市民阶层来说，如果在另外一些条件下，他们是能够走向新生活的，如果在顺利的条件下，即使他们有可能通过光荣的道路来保证自己的物质需要的条件下，像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这样的一些人们是完全能够改正过来，并成为社会上有用的成员的。像玛丽亚这类的人们之所以不好，不是由于性格，而是因为“环境”；周围的条件，生活使他们成为这种样子的。（您早先的全部生活——作者对玛丽亚·阿列克塞耶夫娜说通——使您得出一个结论：人才可以分成两类，即傻瓜和骗子；你认为：正一个人不是傻瓜就是骗子，而且一定不是骗子，只有傻瓜才能不是骗子。）因此（您的手段很卑劣，但您的环境不让您採取别的手段。您的手段应该由您的环境，而不该由您个人负责……目前您在干坏事：您的环境要求您这样：给您另外一个环境您就会乐意做个无害的甚至有益的人了，因为，假定无利可图，您决不轻作恶，只要于你有利，随便什么事您都能做，所以，如果有必要，您也可能做出正直高尚的行为的。您能够这样做，玛丽亚·阿列克塞耶夫娜；您这种才能还没有得到发挥，那些相反的才能则恰恰发挥出来了——这可不是您的过错……您只是一个坏人，倒不是没用的人）（同上书第270页）。

由此可见，按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来说，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不是人们自己应对自己的罪恶负责，而应由他们所处

活的那些条件来负责。许多的人们在另一些条件下是可以更好的。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于人的深刻的信心，以及对于改造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对于改变整个现存制度的必要性的深刻信心就表现在这里。

在这部长篇小说的各种形象当中也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被牺牲者们的形象。

这便是一些「出卖自己身体的女人」：上流社会中的英、法两国女人柔丽和俄国娼妓娜斯佳·克柳科娃，前者没有给自己找到与她所仇恨的生活方式决裂的力量而后者则能够使自己摆脱可耻的生活。这两个女人的不同道路是由她们所处的环境来决定的。

第一个女人，即法国女人柔丽从一个巴黎的街头女人变成了富有军官的妻，这是一个「堕落的」和「邪恶的」女人——但在本质上她则是一个美好、敏感、善良和诚实的人，而她的「堕落」则要归咎于她在其中长大和生活的那个条件。柔丽的悲剧在于她不能够离开这个社会。她被甘于过富裕的寄生生活和在特权阶级中过活的那种习惯来束缚了。虽然她也意识到自己生活的悲剧，理解到只有当她还保持她从前的姿色的时候，谢尔吉才会和她一块儿居住并容许她生活在他的周围，虽然，她也曾经认清到自己暗淡的前途而悲伤，但是她是这样地习惯于过豪华富丽的生活，以致于她没有给自己想象出另一种生活。在上流社会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向她伸出救援之手并使她跳出这个深渊。为了不要用清醒的头脑去正视生活，她便用酒来麻醉自己，使自己整天整夜地过着纸醉金迷的狂荡生活。她再也无法回到诚实和纯洁的生活上去了，她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

她向薇拉·巴芙洛夫娜表白说：「我堕落不是由于我的身体受了凌辱，而是由于我无情和奢侈惯了，不能独立生活，我

需要别人，讨好他们，我做着我不願做的事，——这就是堕落啊！”（同上书第77页）。

美丽的抗议是对人压迫人的丑恶的无情的判决：“别响桂上流社会！——她对薇拉·巴夫洛芙娜说道——那儿都是些卑鄙的傢伙，比我还更坏；有懒惰的地方就有丑恶，有奢侈的地方就有丑恶！”（同上书第77页）

尽管她对上流社会，对上层剥削者极端仇视，然而却不得不周旋在这一环境中间。

另一“堕落”妇女形象——娜斯佳·克柳科娃不只是为了说明“旧纳”社会的情况，而是为了显示旧人向“新人”过渡的转变。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描绘克柳科娃形象时，表明了这社会“淳淳”走上先进的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行列的道路：克柳科娃与一个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吉尔沙诺夫交往起来，而后着那真挚的人类感情唤起了她的羞耻心。在她的心里燃起骄傲和被凌辱的好女的纯洁的感情，于是便引起了精神上的转变。从此时起，她便开始了新的生活。诚实的劳动生活使她与可怕的过去彻底地断绝了关系。克柳科娃在薇拉·巴夫洛芙娜工厂的劳作活动使得一个“街头”妇女转变为堂皇的劳动者，儿童的循循善诱的教导者。她成为“新事业”中自觉的战士，只因肺病而夭折才中断了她进一步的走向解放的前途道路。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娜斯佳·克柳科娃的形象表明了，人并非生来就是好的或是坏的，一切有赖于社会生活，对人的又道主义态度和诚实的劳动可以教育人，并使之成为有益于社会的成员。

这样，由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了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意识与他们的社会存在有所联系，由于表明了在当代社会中某些人因生活资料的过剩或不足而腐化，从而在字里行间便提出了必须根本摧毁现存制度的问题。在描绘剥削阶级代表者的

形象——放荡者，二流子：〔上流社会〕的寄生虫、野蛮又道德不化的资产阶级〔攫取者〕、维护专制制度和统治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和保守派的官吏们的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他们反人民的本质，并呼吁与之进行斗争。

车尔尼雪夫斯基描写的不是贵族中的败类、骗子和恶人，不是头脑空虚的庸夫俗子和资产阶级地主制度中的牺牲者，而是另一些“平民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人物。

这本长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之一，薇拉·巴夫洛芙娜·罗夏里斯卡雅正是他们队伍中的一个。

小说的第一和第二章所描写的主要是她的身世。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指出说，这位女主人公的命运虽然是稀有的，但是对当时的社来说却是一个习以为常的情况，而薇拉·巴夫洛芙娜的身世乃是一种典型的身世。〔我之所以讲述……她的生活，乃是因为我知道，她乃是把自己生活安排得很好的第一批女人中的一个。最初的事变是具有历史兴趣的。〕

作者详细地追溯了她的生活道路，而特别注意的则是她的家庭教育。她的德育是畸形的；父母只注意去使女儿过一种单调乏味的生活。

当薇罗奇卡长成一个美貌的少女的时候，她母亲所特别注意的就是漂亮衣服和如何使女儿找到未婚夫。薇罗奇卡被作为商品一样〔带到上流社会中去〕展示，以广招徕。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在发展中来描写薇拉·巴夫洛芙娜的形象的。在小说的开始便出现了一个〔天真纯朴的姑娘〕，但是她具有着高度的智慧和倔强的性格，她因〔母亲的庸俗习气〕而感到极不安。她还不知道自己的生活道路。但是沉闷的家庭环境使她对生活抱着批判的态度并使它得到坚强的意志力。她无意地吸收了这样的一些思想，它们〔这些思想〕弥漫在